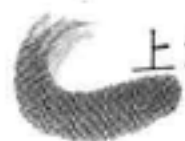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家庭教育期望的近代变迁

在中国传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和职业体系。人们认为商业的过度发展会导致财富的集中，妨碍农业的进行，并可能成为贫富分化的源泉和社会动荡不安的隐患，因此，无论是历代封建统治者还是社会各阶层，基本上都奉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在他们的心目中，商人唯利是图，不劳而获，是与“君子”的道德人格理想相违背的，是道德低下的表现，因而，“耻于为商”、“耻于与商人为伍”成为传统社会的正统观念。而把追求圣人人格理想的“士”作为四民之首，而农次之，所以古代许多家族的家训和蒙学书籍都要求家人在择业时以士农为先，以经商为末，主张耕读传家。但近代以来，上海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商人群体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同时，它也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职业，形成许多新的社会力量群体。特别是科举制废除之后，进一步加剧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和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的解体，重塑着人们的职业价值和人生理想，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家长的教育期望。

一、商人地位的提升与家庭教育期望的转向

在晚清上海，随着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商业不再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下贱的行业，相反，它成为一种自豪而荣耀的职业，成为一种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商业不仅获得了其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基础，而且更是把其发展建立在“与洋人争利”的前提下，这就使商业获得了一个正常的发展空间。加之，源源不断的移民的到来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成为扩大市场竞争和活跃市场繁荣的主体和动力。在这一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价值不断凸显，传统的四民身份和社会职业体系也开始分化和重构。其中，特别是士与商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更是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商人在四民中的地位和角色。与士绅阶层相比，商人们的富有让人羡慕，他们的阔绰令人眼红，但他们富而不贵。为了改变他们的政治地位，更为了寻求官府的庇护，他们通过捐官、捐



资来获得士绅们所享有的功名利禄，从而享受士在传统社会所受到的特殊礼遇，同时积极兴办公益事业，取代了士绅的部分社会职能。这样，商人阶层成为官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一方面，租界的外商们要依赖他们，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国的商业行情，又能打通官府；另一方面，本国的官吏也需要依靠他们去与洋人交好。与此同时，身份、功名等与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联系也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和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和地位的重要标准。谁拥有的资本和财富多，就说明谁的社会地位高。在某种程度上，商业的发达和商人的多少已经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当时的报纸这样说：“商人者，民之命脉而国之血气也。血气衰则国病，命脉绝则民死，此理甚明，无劳蓍决。”^①《申报》也指出：“商人在现世界为最重要之人物，国家之富强视此为转移。”^②所以“商人者，立国之要素也”^③。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不仅经济地位大幅提升，而且其社会价值也逐渐显现，他们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在近代上海商业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与商人有关的相关职业既是社会上最容易谋生的职业，也是社会上最富庶的社会阶层。这些职业包括买办（指中外商业贸易的“中介人”，他们是一批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够沟通各个贸易环节，精通中国银元兑换汇划制度的商人，并能略知英语）、通事（指翻译和经纪人）、掮客（指向各个商号、货栈、钱庄、洋行兜生意的人），同时还有大量的跑街、跑楼、报关员等。他们通过商品的转手买卖和资金的流通赢取大量利润，成为上海市民的中上层。如买办的收入由薪水收入、佣金收入、利润收入和杂项收入等构成，而其中的佣金是最大的一项。有学者把当时上海商人与其他阶层的收入进行对比，指出“买办的年薪似乎并不丰厚，但佣金却十分可观，两项加起来，多的一年可得5万元收入，中等的也可得1万元。而光绪末年，上海中等人家的年收入只有5.6百元”^④。

① 1895年4月《万国公报》。

② 1909年11月6日《申报》。

③ 1909年9月1日《申报》。

④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商人角色的转变以及商人的职业前景，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对商人的固有观念和评价，推动了家庭教育期望的近代转向，成为许多家庭教育子女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近代上海，家庭教育期望的商业化转向主要通过移民群体体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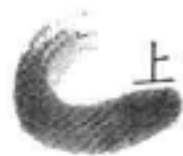
移民是近代上海人口的主要来源。对于移民群体来说，他们背井离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谋生问题，加之从商的丰厚利润以及个人的资质、社会环境等原因，经商成为许多外来移民的首选行业。当时《申报》指出：“华人之欲学西学大半为谋食计，为身家计耳。”^①而要“为谋食计，为身家计”，学商则是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于是，许多家长开始把商业作为子女以后职业选择的重要领域。如徐润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在15岁之前，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孩子一样接受的是传统的家塾教育，但随着与先四叔荣村公的返沪，他的一生也随之改变。尽管在上海期间他曾被送到姑苏西园杨子芳老伯家读书，但终因“口音隔阂，不惟书不能读，话亦不明，于是仍回上海。先伯钰亭公谓既不读书，当就商业，因留宝顺行学艺办事，师事曾寄圃，同学郑济东、许兴隆与余三人学丝学茶”^②。徐润从学丝茶开始，到后来经营房地产生意，每年获得的租金达12万多两，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买办。其儿子徐叔平也从15岁开始同他到各地经营矿业，1900年，叔平回到上海，效法父亲，“做了一家经营航运和进出口的德国洋行的买办。1908年初，他接受了汉美轮船公司买办的职位。”^③再如，郑观应也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家庭贫寒，其父亲从小学习举业，然而未能通过科考而走入仕途，结果只是做了一名塾师，但他却看到在当时经商的优势，积极鼓励郑观应到上海学习商业，结果成为当时著名的大买办。后来，郑观应的弟弟们也相继来到上海经商。

作为晚清上海的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包天笑对其父亲发展道路的回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家长们在子弟教育上的这种实用主义倾向。

① 1896年12月29日《申报》。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见沈云龙：《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49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第4页。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68页。



他说：

父亲到十四岁时，不能再读书，非去习业不可了。从前子弟的出路，所有中上阶级者，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读书，一条是习业。读书便是要考试，习举子业，在科举上爬上去。但是父亲因为幼年失学，已经是来不及了。而且这一条路，有好多人是走不通的，到头发白了，还是一个穷书生。所以父亲经过了亲族会议以后，主张是习业了。^①

这里指出，“读书”与“习业”是传统社会为子弟发展设定的两条道路。但实际上，在近代之前，家长只重“读书”，而不重“习业”，家长也不会根据子弟的资质去为其选择发展的方向，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在近代的社会变革中，特别是上海中外商贸往来的繁盛，给人们认识社会职业提供了重要窗口和参照。面对历来的考科名之难，当时许多家长开始采取根据子弟的天赋和经历来决定其以后所从事的职业的做法。包天笑所说的“习业”，其实就是经商。他接着又写道：“习业最好是钱庄出身。以前没有银行，在北方是票号，在南方是钱庄。凡是钱庄出来的，好似科举时代的考试出身（又称为正途出身），唱京戏的科班出身一样，并且钱庄出身的最好是小钱庄的学徒出身，方算得是正途一般。”尽管当时“学徒是很苦的，尤其当那种小钱庄的学徒，如做童仆一般”，尽管“祖母只有父亲那样一个儿子，而且是遗腹子，如何舍得”，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计，只得忍痛让他去了”。^②看来，从商也是有条件、资格的，也讲一个出身，而这个出身就是你所接受的商业教育。正因为如此，到钱庄习业，接受初步的商业教育成为许多移民家长的家庭教育期望。

由上可知，近代上海家长在家庭教育期望上的商业化转向，其首要目的是谋生，是“为身家计”，是基于自身生存的以移民为主体的粗放型商业化发展模式使然，它与西方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基于商业理性的精致型商业思维模式不同。有人在比较了中西商业发展的路向后指出：“洋商来华者自幼读书而各项商务皆有专门之书可读，华商自幼略识之

^{①②}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1~12页、第12页。

无即出学徒，徒恃耳食，难有心得，故华商与洋商交涉鲜不为所欺蒙。”^① 这表明，西方人把商业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研究和学习，而中国家长并非如此，只是为生计、糊口和生存学习，因而难免不受蒙蔽，其中折射出当时沪上华人经商的普遍状况。当时《时务报》也指出：

英国驻扎德国斯铁陈领事，具报该国政策云，斯铁陈商务公所，起于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交战方罢之时，该府商民等，谓须盛兴海上贸易之业，即创设此商务公所，先以养成商务子弟为第一义。博募生员，授以商业之法，业成之后，简派之于外国，欲以收利益于四方。^②

这里对德国斯铁陈商务公所关于德国家长们重视把子弟们养成商务专门人才的介绍和强调，同样说明我国家长在子女教育期望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从晚清开始的家庭教育期望的商业化转向，表明许多家长开始逐渐抛弃昔日“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和博取功名的价值追求，突破了传统家庭教育的藩篱，解构了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框架，从而在传统家庭教育系统之外为人们进行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家庭教育开辟了道路。自此，商业化所蕴含的个人实用主义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追求，也逐渐成为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家庭教育发展的基本精神。

二、近代新兴社会职业的兴起与家庭教育期望的多元化

近代上海社会职业体系的重构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传统社会职业体系的分化和解体；二是近代新型职业体系的建立。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近代上海职业变动的生动画卷，而这一变动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上海的家庭教育，使其在子女教育期望和职业选择上日趋多元化。

第一，传统社会职业体系的分化与解体。

在看到晚清上海商业社会形成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教育的强大势力及其在社会和民间的广泛影响。有人曾指出：“士而惟知习帖括

^① 1898年10月1日《中外日报》。

^② 1898年3月3日《时务报》。



以应试，则士失其为士矣，三者既不重于时，而其所见重者又忘其所以见重之意，是四者皆失其道也。夫四者为天下之恒业，四者失其道，则上多废旷之事，下起游惰之风，欲人才之盛不亦难乎？”可见，尽管许多士绅转向绅商，但依然有许多士人，主要是地位较低的一般知识分子仍恪守着让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科举之学”和“应举之业”。该文作者认为，中国并不缺乏人才，原因在于聪明灵慧的子弟潜心于“应试之作”，而执艺事者又都是“椎鲁之人”，因此不能实现人才的合理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深入反思教育的内涵和人才的培养，重新思考“习”与“业”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学而优则仕”这一“读书（教育）—做官（职业）”的内在逻辑，而是认为既然社会有四民之分，教育就应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据报载：

自后人误会教子之意，以为除读书而外，别无所谓教，于是幼年子弟除读书而外，别无所谓业，不知人各有能有不能，小知大受。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今乃一概强使读书，质钝者无可进益，必致成废，此安得不误其子弟哉？夫人生斯世，厥有四民，士居其一，农工商居其三，可知教育之才原不仅使为士，苟能于三者之中学成一端，何尝不可以为恒业？而三业之中，又条分缕析，名目繁多，通一事即可得一事之用，执一业即可食一业之力，虽有小大之分，而其所以谋食则一也。今之人其稍获温饱者，莫不送其子弟入塾读书以博科名，即贫不能从师者，有义学之处，亦可送入而卒之，游荡无藉者多，能执技以糊口者少，此其故何哉？慕读书之虚名，忘蒙养之至道，耻于学艺，而安于从容。少时血气未定，既不能读书以明理，复不屑学艺以谋生，日事嬉游，成群聚党，穿街度巷，目所见者，皆浮靡之习耳，所闻者皆虚矫之言，其有不渐为浸渍习与性成者乎？^①

在这里，论者严厉指出家长们在子弟教育期望上的种种误区，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家长们对“教”字的误解所致，“自后人误会教字之意，以为除读书而外，别无所谓教，于是幼年子弟除读书而

① 1890年10月15日《申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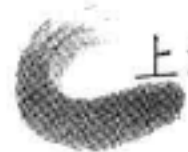
外，别无所谓业”，于是发出了“是不亦大缪乎”^①的惊讶。针对这种现状，人们积极要求去除徒慕虚名之风，主张把读书和谋生、职业结合起来，力求子弟学有所用，以至不荒废他们的前程。这一对“教”字内涵的重新解释及对“习”与“业”关系的诠释和理解，突破了人们关于“读书—做官”的线性和单一思维模式，在观念上为人们近代职业的多元化选择准备了条件。

随着人们职业认识的深化以及商人社会中心地位的确立，晚清上海开始出现了以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资源集聚和社会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士绅向近代绅商的转变成为近代社会的独特现象。其中，以盛宣怀对近代上海工商业的投资和创办为代表，揭开了传统士绅向近代绅商转变的进程。到甲午战争之后，这种转变已经成为士绅阶层的普遍认识。以前，士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既是维持封建统治的主力，也是地方自治的主体，他们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因而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声望。但现在，一种商业化的社会运作模式，如同一股巨大的浪潮一样，把以往的功名和社会地位一起抛弃，不仅使他们无以应对这种现实，而且必须重新定位在这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有学者曾把近代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概括为三个时期：一是19世纪60年代之前通过科举的封建性社会流动；二是19世纪60年代至科举制废除前士绅与商人相互运动的近代开放型社会流动；三是废科举与新式学堂勃兴后士绅群体的结构性社会流动。^②可见，在近代变革社会，士绅阶层经历了一个由以身份和出身为基础的稳定型上升性流动到面对商业社会冲击而造成的被动无奈式流动，再到科举废除后由于身份功名的缺失而所造成的自主选择式流动。有学者指出，由绅向商的社会流动“在绅士集团转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基本上淡化了传统身份的吸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流动现象。这一趋向是由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的变动，而这种由职业取代身份地位的变动，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过程，是挣脱等级束缚，获取‘个性’自由的历史过程，尽管在近代

^① 1892年4月2日《申报》。

^②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



中国，这是极为有限的”^①。士绅阶层向绅商的转变，既是其摆脱封建身份等级限制和获取自由的过程，也推动了近代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他们与封建官僚的密切关系及其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地位，因而在投资近代新式金融机构、工矿企业、铁路建设、市政工程乃至创办新式教育、新闻出版、社会组织时，往往能够取得成功，从而成为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最有声望的社会职业群体。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导致农村经济的日益萧条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过剩，他们纷纷涌向城市做工谋生，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充裕的就业机会，这样，他们逐步从农民阶层转向工人或城市贫民阶层。另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国外商品的强力竞争，中国的民族手工业也濒临破产。如果不能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必致淘汰。在这种情况下，一小部分民族手工业实现了艰难的转型，而大部分则遭到淘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近代变迁，进一步加剧了传统的职业分化和解体，并引发了新的社会流动。

第二，近代社会职业体系的建立。

上海自开埠以来，随着外贸中心地位的确立，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及其附属的轮船修造业、打包业以及为外国商品进入上海服务的再加工业都获得了迅速发展，以后又出现了机器缫丝、印刷、卷烟、制药等外资工业。到甲午战争前，上海已经成为外资工业最密集的城市。

在上海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上海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市政设施不断完善，从而催生了一批新的社会行业 and 职业。1865年，上海自来火公司成立。同年，上海到吴淞的陆路电线架设完毕。1870年，海底电缆通到上海，电报电话、邮政系统得以建立。1883年，设立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1892年，上海建成中国第一家发电厂。另外，公共租界工部局为加强对租界的管理，还出现了巡捕的职业。上述新兴电话业、电报业、邮电业、海关、电力等行业的出现，特别是其较高的社会地位、优厚的待遇和高额的薪俸，成为一些人追求的目标和家长对子弟的就业期望，但要获得这些职位，就必须接受相应的教育并通过考试。到

^① 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2期。

20 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密集近代工业企业的近代新型工商城市,新兴职业的从业人数大幅增加。

在近代职业体系的建立过程中,科举制的废除起了重要作用。1905 年 9 月 2 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 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宣告了自隋代起实行了 1300 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人们依靠功名、身份博取社会地位的神话,阻断了依靠科考来进身的社会台阶,瓦解了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和职业体系,客观上为近代职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为家庭教育期望的近代转型创造了条件。

科举制废除之前,尽管新兴职业和新式学堂已经出现,但“然科举尚未停止,则为父兄者,希望科举之心未绝,以为学堂之教育不适于,故士人一部入学堂之心已减其半”^①,所以,许多家长仍把科举作为子弟发展的基本路向。直到科举废除,“选举之法一变,旧教育之制度,亦失其依据而不能独存。于是向之从事于科举,而恃以为衣食者,皇皇焉如穷人之无所归,此数百万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之徒,向则虽类于闲民,而犹有所恃以为生,故为民之蠹而不至显见其害。今则无所于归,其四溢而为患者,或恃刀笔以鱼肉乡愚,或挟私见以阻挠兴学”^②,从而彻底阻断了学仕合一的发展理路,切断了“‘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使‘士’演变为新型知识分子”^③。此后,受西学新思想、新观念影响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壮大,由于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因而大多分布在金融、工业技术、医学、外交、军事等专门行业,也有一部分从事教育、新闻出版等职业。

科举制的废除一方面为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又为与近代社会特别是上海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诸多社会行业和职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不再以出身、身份和资格作为衡量社会地位高低和职业贵贱的基本标准,不仅原有的近代职业人数倍增,如上海海

① 1905 年 3 月 29 日《申报》。

② 1906 年 2 月 9 日《申报》。

③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3 ~ 124 页。



关建立后，“征税、前船钞和邮政三科人员的总数，已从 581 人增至 1027 人，比十年前几乎增加一倍”^①。再如，从 1912 年到 1921 年，“邮政局员工在这十年中约增加了一倍，仅上海地区目前就有 1336 人”，并在“1919 年对 79 名邮差进行英语特别训练，1920 年又训练第二批，计 117 人”。^②而且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行业和职业，如市政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经理、会计师、医生、护士、警察、律师等，由于社会对这些职业有着广泛需求，因而也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并成为家长教育子弟的基本追求。

到民国时期，上海的近代职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其中处于社会上层的是外商、银行家、企业家、大买办、大官僚等，处于中等地位的是社会上的职员阶层、普通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而处于下层地位的则是部分工厂工人以及自谋职业者。这一社会职业划分与清代对职业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清代地方志中，“职业”项目通常分为：官、绅、农、工、商、勇，但到民国年间新编的地方志中，体现社会分工的“职业”项目最终排除了带有浓厚身份等级特色的“绅士”一项。^③有学者进一步把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划分为九个阶层，分别是：1. 外侨、清朝贵族、大官僚、大太监、大军阀、豪绅富商；2. 外国银行、洋行的董事、高级职员和买办；3. 大型工厂、商店和银行的投资者、经营者、社会名流；4. 银行、公司和大型工厂、商店的专业职员、高级雇员；5. 中小工厂、商店投资者和经营者、出版商、主编、律师、医生、教授、一般政府职员、公司职员；6. 小企业主、店主、高级店员、中间商、包工头、行帮头、工头、技术工人；7. 手工业者、商贩、店员、学徒；8. 工厂、商店和手工作坊的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矿山、运输、建筑、装卸等行业的工人和季节工、临时工、小摊贩等；9. 自谋生计者、苦力、娼妓、乞丐、难民等。^④这一分层比较典型地反

①② 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01 页、第 199 页。

③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1～102 页。

④ 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9 页。

映了当时上海的社会结构和职业体系。

近代上海社会职业体系的建立及其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对家庭教育的目的和期望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新的社会职业体系所蕴含的内部规则和平等原则，改变了以往以功名和身份为目的的教育价值取向，而代之以财富、知识、能力为主的教育价值观，使家庭教育期望由身份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由伦理本位转向知识本位、由封闭转向开放。第二，新的社会职业体系的建立不再使家庭仅仅局限于成就子弟的道德人格，它突破了以往家庭教育“做人”的单一价值追求，而是与其日后的社会职业及生涯发展联系起来，体现出家庭教育期望的现实性、实用性和功利性。第三，近代上海社会职业体系的多层次性和多元化格局，有助于家长根据自己子弟的天赋、资质及能力进行教育，从而促进了家庭教育目标和期望的多元化，同时，它又通过培养了一大批适应近代各行各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发展。

第二节 女性与家庭教育变迁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宗法社会，受父权家长制和男女两性社会分工不同的影响，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家庭格局和家庭角色。早在《周易·家人卦第三十七》中就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指明了男女在家庭中的不同分工。而这种家庭分工是与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旨在维系家族延续的家族伦理和制度安排是分不开的。费孝通先生指出，“父母与子女、夫与妻这两种关系是家庭组织的基本轴心。但在中国所谓的家，前者的关系似乎更重要”，其原因在于“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①。可见，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主要是由父子构成的一种纵向关系，夫妻关系只是处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2~43页。